

現代世界的建構

陈方正 著

SPM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現代世界的建構

陈方正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世界的建构 / 陈方正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8-13137-5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现代化研究—世界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2905 号

XIANDAI SHIJIE DE JIANGOU

现代世界的建构

陈方正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书名题签: 金耀基

主 编: 李怀宇

责任编辑: 李展鹏 张 静

装帧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 杰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3157 83795240 邮购: (020) 83795240

自序

三十年前我初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时，中国的改革大潮正风起云涌，许多学界朋友兴奋莫名，言谈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随后不久，风暴来临，憧憬幻灭，大家又对未来道路生出许多坚定不移的看法，认为中国应该这样或者那样走。我却没有这种信心和勇气。我觉得，未来是开放的，不确定的，中国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最好走什么样的道路，都不那么容易看透，我们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尽量观察其他民族在近代发展中所获得的经验、所碰到的困难，从而作些比较和思考，如此而已。

不过，我很快发现，这种简单的想法并非大多数学者朋友所能够认同。其背后原因似乎是：大家都觉得中华民族是个特殊民族——它超庞大的人口、连绵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文化都是独特的，不是其他文明所能够比拟的，因此把它和其他民族去作比较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即使做了，也不见得会有什么意义。至于西方学者，则颇有人对所谓“现代化比较研究”（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感到极大兴趣，普林斯顿大学的布莱克（Cyril Black）和罗兹曼（Gilbert Rozman）就是很有名的两位。然而，与罗兹曼一席谈话，也拜读他们两位的著作之后，他们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也不得我心。这主要因为他们本着专业中心

主义，完全依赖社会经济数据的对比，而忽略文化和历史因素，也就是人作为现代化原动力的重要性，更因为在底子里他们并未脱离西方中心意识，没有看到某些西方国家（最明显的莫过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同样有严重的现代化问题。

所以，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在这方面陆陆续续做的一些工作都是就大家不甚熟悉的题材和角度立论，从而落在主流论辩和交锋以外。例如本书第二辑开头两篇文章本来是 1991 年初夏威夷“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反思”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会上虽然有许多相熟朋友，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原因很简单：大家对奥托曼和土耳其历史都很陌生，也不太感兴趣，因此虽然它和中国在 19 世纪 2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之间的历史进程有极其相似之处，也有颇为戏剧性的对比，却鲜为中国学者注意，人人无动于衷。这令我覺得十分惊讶，也十分遗憾。我想，这和国人对于外国文明、文化、历史缺乏浓厚和深入兴趣（但西方文学是例外），恐怕有点关系吧？为此我曾经在 1995 年初的海口国际汉学会议上发过一番议论，大意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做学问似乎太“内向”了，对域外事物缺乏好奇和探究、剖析、审视的冲动。作为对比，我引了法国学者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话。他分析西班牙人何以能够以数百勇士征服墨西哥数千万众之后，得出如下结论：“这惊人的成功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也就是这一能力，使得“欧洲三百五十年来同化别人，消除外在界别的企图，基本上得以成功”。^①然而，这

①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Richard Howard, transl. (New York: Harper, 1985), p. 248.

议论带来的反应只是一片难堪的沉默。过后有一位老先生在我耳边细语：“你都不知道，在大学里面教外国史做人多难呀！”那番不合时宜的话本来出自我为“西方冲击下的世界”翻译丛书所写的总序。该丛书一共六种，在1996年底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它见证了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现代化比较研究所作的小小努力，本书《对三个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和《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两篇文章，就是其中译著的序言。

至于本书其他篇章，也各有不同渊源，包括受到苏联突然崩溃这不可思议事件的震撼所激发，在报上连载发表的回顾感言《圣洁与邪暴》，和为学术会议、刊物、论文集撰写的多篇文字。它们大多就事论事，并没有整体计划或者主导思想，但也有一条隐约贯穿其中的线索，那就是对激进与改良之争的关注。这场大辩论是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悲剧所引发，它导致了对激进行动和近代革命的强烈反应和全盘否定，也就是“告别革命”的呼声。不过，在我看来，那许多痛心疾首的言论恐怕都是情绪冲动而非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在社会需要作出根本变革的关头，激进革命往往是多次渐进改良的失败所激发，换言之，是在穷途末路之中被逼迫出来的，而非从容选择的结果。本书第二辑第一、第二、第四三篇长文占了全部篇幅将近三分之一，它们至终所显示的大概便是这个道理。而西班牙现代化进程屡屡失败（《对三个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一文第二部分），也正就是在牢不可破的传统重压之下，多次革命胎死腹中或者被镇压所造成的悲剧。

与激进革命相对立的是渐进改良，它有两个为人津津乐道的典范，即英国和日本。对于这两个例子所引起的问题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作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但问题太大太复杂，

迟迟没有总结成文。后来有关明治维新部分终于借着参加新亚书院金禧校庆研讨会的机会发表，即本书第一辑《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一文。至于有关光荣革命的部分，则拖延很久之后，意想不到地居然碰上了平卡斯（Stephen Pincus）划时代巨著的出版，那不折不扣是新世纪的大翻案文章，对我而言更是出乎意料的惊喜，因为心中所长久猜想的观点至此得到证实，即光荣革命在本质上同样是激进革命。而且，对于它何以长期以来被人误解为温和变革而非一般意义的革命，此书也作出仔细解释：那是多位“辉格史学家”为了反对共和思潮而有意识、有计划地歪曲所致。所以为此书撰写评论（本书第一辑《为不算革命的革命翻案》一文）真可谓平生快事。

比较五四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那两篇文章（第一辑的《五四独特的吗》和《从大逆转到新思潮》）前后相隔十年，分别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的研讨会撰写的。前者重点在阐明“反传统”是那两个运动的共同起点与基调，我们不应该因为主观上觉得需要看重两个运动“正面”或者“建设性”的那一面而忽视这个起点的重要性。至于后者，则重点在于详细剖析这两个运动的兴起过程，借以说明它们同样是受外来强大刺激所产生，我们觉得它们的根源有“受外来影响”与“自身发动”的分别表面上顺理成章，其实是未曾深入分析启蒙运动的渊源所得的假象而已。这两篇文章发表至今已经多年，这两点始终未曾引起注意和讨论。但我相信，它们的确是了解五四和启蒙那两个思想运动的关键。

时光荏苒，五四运动的百周年转眼就要来临，倘若以伏尔泰《哲学书简》的出版为起点计，启蒙运动的三百周年祭也为期不远，而从这本集子第一篇文章发表至今，也超过四分之一

个世纪了。就在这短短二三十年间，世界形势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就是中国的悄然崛起：一百六七十年来的积贫积弱转眼已成过去，长久渴望的富强，不知不觉间竟然已经接近，似乎触手可及了——当然，如影随形仍然未曾摆脱的，也还有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新老严重问题，但无论如何，对欧美、俄国、日本、中国乃至土耳其，所有这些我们最熟悉也最关心的地区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作为一堵必须艰苦攀登的拦路峭壁，一个必须忍耐渡过的地狱煎熬，那样一个阶段其实已经过去。现在它们所共同面对的，是在全球化大潮中，如何各自凭借本身优势，也仍然带着、忍受着本身可能极其深刻的缺陷，来相互竞赛，力争上游的崭新局面。因此，不能够不坦白承认，这本集子所讨论的那些天大问题，有相当部分已经失去紧迫性甚至现实意义，而变为纯粹的历史回顾了。

但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此时此刻来回顾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五四与启蒙那两场扣人心弦的思想运动，实在不免令人掷笔四顾心茫然。因为这些曾经如此激动知识分子心灵的运动虽然好像是彻底改变了世界，然而改变的方向却和原来那些崇高、美好的理想不再是同一回事。它们并没有“落空”，而是很微妙地，在大众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被大众消费社会所消融，被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商业运作全面渗透，被日益强大不可遏制的国家机器所宰制——也就是无可抗拒地落入赫胥黎所谓的“美丽新世界”深渊中去。因此，倘若我们的头脑还没有完全被眩惑而麻痹的话，那么就不能够不怀疑：当年到底是启蒙或者五四这类思想革命在改变世界，还是其他更根本、更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譬如说科技，在底子

里主导世界的改变，而思想运动只不过是其表征而已？对于人文学者来说，这样的念头是极其不愉快，乃至大逆不道的。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铺天盖地的电脑、机械人、互联网正在迅速宰制一切、取代一切（包括人类本身）的时代，这种疑惑的油然滋生也是无法避免的了。

这些文章大部分已经出版多年，现在蒙李怀宇兄的建议和帮忙，得以重新结集面世，我谨在此向他致谢。

2017 年端午后于用庐

目 录

第一辑 五四与启蒙运动

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重新探究和评价光荣革命	(3)
五四是独特的吗？——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比较	(17)
从大逆转到新思潮——五四与启蒙运动比较重探	(49)
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日本启蒙运动的反思	(77)
论胡适对科学的认识与态度	(92)

第二辑 土耳其、俄国与西欧

毁灭与新生Ⅰ：奥托曼帝国的改革	(113)
毁灭与新生Ⅱ：土耳其的浴火重生	(137)
从胡适和格卡尔普看中国 and 土耳其的新文化运动	(163)
圣洁与邪暴：俄罗斯灵魂的两面	(195)
对三个现代化历程的反思	(257)

第三辑 现代的传统根源

中华与西方文明的对比——有关科学与宗教的一些观察	(275)
中国与欧洲高等教育传统比较初探	(287)
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兼论西方法学传统	(321)
慧星小史：它和科学、宗教与政治的纠缠	(330)

第一辑

五四与启蒙运动

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

——重新探究和评价光荣革命

历史上有一场革命，是大家都颂扬、称赞，认为只带来进步、建设与光明，而没有野蛮、流血和残酷，更没有破坏、混乱和倒退的；是大家都承认，它如此平和、美好、圆满，实在不应该和历史上其他那些充满斗争、杀戮，犹如天崩地裂的政治大转变相提并论的。不用说，这独一无二，简直不算是革命的革命，所指就是光荣革命，近代民主政治的开端。在一般人心目中，它的过程很简单：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85—1689）^① 企图以高压手段将罗马天主教强加于英国社会，信奉新教的民众和议员群起反抗，将他驱逐，迎奉荷兰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89—1702）登基，又得到他的承诺，君权必须和国会共同行使，由是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所以，这是一场不流血革命，在短短几个月内政权就和平地转移到新君和国会手中，民权、自由、宽容原则自此确立。它是以最小代价，在最短时间，获得最大进步，是最高效率的政治变革。

① 括号中年份为君主在位年份，下同。

一、里应外合的武装政变

但是，为什么英国这一次革命就如此完美和干净利落，就和日后其他革命完全不一样呢？是英国的民众和政治家特别有理性、智慧、远见，是英国的社会结构特别完善，它的政治传统特别优良吗？还是这个国家在文化或者法律上有什么秘密？抑或它是由因缘际会造成？这是个不能不追问的问题，否则在完美光洁的外衣包裹下，它就会从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被剥离出来，成为独特事件，从而失去在政治史上的意义。不过，要认真面对这问题，就不能够不探究一些细节，甚至关注英国以外的事情，例如，威廉三世到底是如何被“邀请”入主英国的。

要了解这个过程并不困难，因为伊斯雷尔的《荷兰共和国史》^①对此有详细论述。翻开这本逾千页的皇皇巨著就会知道，威廉三世其实是以倾国之力，调集两万大军、四百艘运输船只和五十三艘军舰，来横渡英伦海峡的——以船舶计算，那比百年前企图入侵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足足有四倍之多！所以，和一般印象相反，威廉的“入主”绝非轻装简从、和气洋溢的“受邀”，而是自六百多年前诺曼人征服英国以来最大规模的跨海入侵，是荷兰人以国家命运作为筹码的豪赌——西班牙君主腓力二世的豪赌惨败就是名副其实的“覆舟之鉴”。既然如此，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荷兰人为何要孤注一掷，冒此奇险？为何实际出兵又并非在英国“七君子”密函要求援助的

^① Jonathan Isrea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1688 年六七月间，而选定于风高浪急的 11 月？这是两个最自然不过的问题，而答案则是由英、法、荷三国错综复杂的外交、军事关系决定的。英国是新教国家，基本上亲近荷兰，在 16 世纪它们就曾经联合对付西班牙，荷兰由是得以独立；然而，到了 17 世纪，英国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历届君主倾向罗马天主教，因此和法国关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荷兰在独立过程中发展成为新兴海上贸易强国，势力、财富于 17 世纪中叶达到巅峰，这导致它和英法剧烈冲突，由是发生了 1650—1670 年间的两趟英荷海战，以及 1672 年的英法联合入侵，当时荷兰濒临亡国边缘，最后是靠打开海闸自淹国土，才得以退敌救亡。十六年后即 1688 年，荷兰处境更加不妙：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此时已经羽翼丰满，正在逐步实现主宰全欧洲的大计，法荷战争一触即发；英国的詹姆斯公开信奉天主教，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和常备新式陆军，而且唯路易马首是瞻；至于荷兰各省（它们是高度独立的，全国议会必须得到省议会授权才能够采取行动）则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在此背景下，以上两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了。就荷兰全国而言，十六年前兵临城下的惨痛记忆犹新，亡国危机已再度出现，所以趁英国民情汹涌，一致反对詹姆斯专权和“天主教化”政策的时机，破釜沉舟，先发制人，以图打个翻身仗，那是果敢决断而非盲目冒险的行动。就威廉三世个人而言，他和英国王室关系密切：本人是英王詹姆斯的外甥，夫人玛丽（Mary Stuart）是詹姆斯的女儿，在法理上有资格继承大统，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的“七君子”又致密函予他求助，这代表了教会、贵族和士绅的广泛支持。所以他可以说是碰上了千载难逢、“天与人归”的好时机。但即使如此，当年六七月间法军虎视眈眈于旁，本国

各省议论纷纭于内，所以他仍然必须耐心等待。而最后决定大局的，则是路易选择在 1688 年 9 月加剧对荷兰的贸易战争，这至终激起了荷兰人的同仇敌忾，使威廉得以说服议会将他的大计付诸实施。同样关键的是，路易决意和德国诸邦开战，于 9 月底挥军进围莱茵心脏地区，由是为荷兰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短短一个月后威廉就断然率军渡海了。所以，他是经过处心积虑部署，然后看准时机，以雷霆一击而成就大业，他的“黄袍加身”绝非幸致。

二、两百年来第一翻案文章

这些细节说明了一件事情：光荣革命不仅是英国内部的转变，而且和欧洲国际政治息息相关。没有决心打“翻身仗”的荷兰和威廉三世，没有失策的路易自动“配合”，都不会有这样一场革命。不过，尽管国际形势导致了这场革命的形态和进程，它的基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在国内。威廉有他的动机和实际考虑，那么他的对手詹姆斯又如何？他执意以高压手段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弄得众叛亲离，心中到底有何图谋、打算，抑或只是糊涂、固执、一意孤行而已？他有众多谋臣，有法国奥援，更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舰队，怎么会两军尚未交锋就仓皇出奔，将王位拱手让予女儿和外甥？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到底何在？1688—1698 这场革命所代表的，仅仅是主教和贵族的“拨乱反正”吗，还是政治、社会和宗教上的整体和深层冲突？

三百年来，这些问题已经有无数学者、史家讨论过了。他们大多数是将之作为 17 世纪英国政治史的一部分看待，但以之作为主题来全面和深入研究的也代不乏人，其中 19 世纪麦